

郑振满,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,博士生导师,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,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。先后出版《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》、《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》(与陈春生合作)、《乡族与国家: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》等多部著作。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遗产研究”,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清代闽台社会形态与地方行政比较研究”等课题,曾获多项教育部、福建省教学成果奖和研究成果奖。先后应邀访问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荷兰、日本、新加坡等世界著名大学,担任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客座教授、台湾成功大学客座研究员。

## 历史研究与参政议政

### ——福建省政协委员、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访谈录

●本刊特约记者 陈毅萍

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郑振满是无党派代表人士,省政协委员,从事史学研究30年,在教学、科研、对外学术交流等领域成效显著,影响广泛。近日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他。

问:您的历史研究主要在民间文献的研究上,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?

答:对于民间话语的研究,在历史学界已经形成一个流派。但仅仅关注民间并不足以解决问题,应该将民间和政府、民间和精英进行纵向的“打通”。历史研究需要原始资料。而我将视野放在“族谱”等民间历史文献上。读民间历史文献的难度,既在于寻找资料,更在于“读懂文献”。很多学者,特别是海外学者在“读懂文献”上的功夫并不过关,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并没有“通识性的”了解,不了解历史的语境,当然面对文献无所适从。我在海外担任教席期间,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做“民间文献学启蒙”的工作,帮助学者读懂文献。

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由“熟人社会”进入“陌

生人社会。”而从这个意义上说,中国早期海外移民,其实早在明朝就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。在南洋的华人社会其实就是由一拨一拨的移民在一个“陌生人的社会”里建立起来的。研究福建移民宗族的族谱,就是对这段“现代化”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考察,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。

问:您在台湾做学术交流一年多,有何体会?

答:在台湾做访问学者期间,我深感台湾多年的去中国化教育的遗毒甚深。在给台湾的研究生做论文评委和指导时,我经常告诉他们,不了解大陆的传统,就做不好台湾史研究,因为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。最近我参加台南史的系列研讨会,也一直在强调,台南史的研究并不是台南的问题,也不仅是台湾的问题,因为在中国历史上,台湾曾经是帝国的边疆,台南曾经是海运的枢纽,同时又是多种族群、文化汇聚之地。因此,研究台南历史,必须有整个中国、甚至整个亚洲的学术视野,不能只局限在本地。

问:您从1990年以来,发表了不少民间信仰的研

究成果。能否介绍这方面的情况?

答:我在研究家族的时候,开始考虑仪式传统对社会组织的影响。在分家以后,为什么会形成宗族组织?这是我当时考虑的主要问题。我认为关键在于拜祖先,这是宗族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。这个阶段的研究,包括两方面的内容:一方面是道教史和地方神崇拜,另一方面是宗教仪式和地方组织的关系。

我做道教史的研究,是跟丁荷生学的。丁荷生是美国人,道教史的专家,主要研究闽台道教和民间信仰。1984年,丁荷生来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,后来我就经常和他一起跑田野,到各地看仪式,收集文献资料。我刚开始对道教一窍不通,到庙里连一尊神都不认识,仪式也看不懂,但我对文献资料很敏感,只要看到有文字的东西就抄。几年以后,就积累了不少资料,开始和丁荷生合作写文章。我们合作的第一篇文章,是在台湾中研院《民族学研究所集刊》发表的《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拜》,主要是对《道藏》和福建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。我们发现正统《道藏》中有不少福建地方神的资料,但主要与福州地区的徐真君崇拜有关,其次是莆田地区的妈祖,在《道藏》中有《妈祖经》。其它地方神在《道藏》中找不到相关资料,可是有许多民间道士编写的道教文献,即使没有系统的道教科仪本,也会有一些类似道教文献的经文、咒语、唱词等。我们认为,这些不同形式的道教文献,反映了道教和地方神崇拜结合的历史过程和地域差别。后来,我和丁荷生还合作写了一些民间宗教仪式的调查报告,主要是用英文发表的。

我自己独立做的民间信仰研究,最初是关于闽南地方神“保生大帝”的研究。保生大帝是宋代的地方神,在《宋会要辑稿》中有他被赐封的资料,但他的封号是“真人”,根本就没有“保生大帝”的封号。我们后来在泉州郊区的一个庙里发现了两块碑文,其中一块是万历年间的,记载当地的乩童通过扶乩降神,得知保生大帝的来历;另一块是顺治年间的碑文,介绍了降乩的神明和保生大帝的关系。何乔远编《闽书》的时候,收录了保生大帝的故事,后人在编纂地方志和道

教文献的时候,也都采用了这个故事。我通过梳理保生大帝的来龙去脉,讨论了国家、道士、士大夫、乩童如何共同建构民间信仰的历史过程。

问:作为历史学家,您认为田野调查的意义是什么?

答:对于历史学者来说,我认为田野调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义,但首先是开发新的史料来源。我们虽然已经有很多历史文献资料,有二十五史,有四库全书,有各种文集、笔记等等,但这些都是反映王朝和精英的历史,我们很难从中了解民间的历史。所以,我们必须走出图书馆,到各地去收集民间历史资料,了解老百姓的历史。在田野调查中,不仅可以找到各种民间文献,还可以收集口述资料和实物资料,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里都是看不到的,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更全面、更丰富的历史过程。

问:作为无党派人士,您担任省政协委员十年,能否谈谈参政议政方面的情况?

答:作为无党派人士,我担任两届省政协委员,我很珍惜这个荣誉,我认为这是民主权利。十年来我没有缺席过一年一度的省“两会”,而且从头到尾,从不半途而废。无论是政协小组讨论还是参加厦门市的有关征求意见会,我都积极参政议政,从不选择沉默。我的建言范围很广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就如我的研究。如,在去年的省政协会议期间,我就大学城建设问题、做台湾人民工作问题、地方土地财政问题、借鉴台湾经验改革养老制度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提案、意见和建议。其中“关于研究台湾社会必须了解台湾媒体”的意见,得到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于广洲同志的批示。今年“两会”期间,我提出“弘扬福建精神应注重研究海外福建人”、“加强两岸交流,解决台湾去中国化问题”等一系列建议。今年,我提了三个提案,其中《关于开展全省文化资源普查的建议》和《关于加强涉台民间信仰管理的建议》,引起省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,他们都上门找我,进一步征求意见。今后我将一如既往,尽心履职,发挥专业优势,为促进文化繁荣发展,关注社会、民生等重大问题,积极建言献策。